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云南省地方志学会 编



方志理论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方志理论研究

第一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云南省地方志学会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编

方志理论研究

第一辑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
云南省地方志学会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云南科技印刷厂排版
昆明市福德三环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5 字数：178（千）
1990年8月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1025-065-5/K.17

目 录

枣花虽小结实诚

——序《方志理论研究》	宁 超(1)
扩大方志研究的视野	温益群(6)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与认识国情	陶学宪(15)
从志书的体裁谈“述而不作”	齐 越(23)
论志书“大事记”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	木 目(33)
略谈概述编写要点	张曙东(43)
志书的人物记述究竟是“传”还是“记”	李成鼎(52)
人物传写不“活”的原因分析	晓 犁(59)
人物志随笔	钱成润(70)
论地理志的几个问题	崔 明(78)
政治运动集中记述的思考	车光杰(85)
县志经济部类设志立目十议	梁耀武(97)
编纂金融志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雷加明(106)
交通志框架与条目要素刍议	黄恒蛟(112)
商业志编修探微	王竹能(121)
省志民族志基本模式初探	秦 榕(128)
浅析县志民族部分的编纂	田文桢(138)
谈谈文学志	蓝华增(146)
风俗志是地方志中最有特色的内容	余孟良(154)
法定计量单位在志书中的应用	李天祥(162)
论修志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沈志文(168)

史志关系剖析	刘文汶(176)
志书竖写探讨	严 实(184)
省地县三级地方志书内容重复交叉刍议 ...	李景煜(199)
漫谈新方志审稿	李学忠(206)
志稿评审应把“五关”	刘锦东(218)
怎样进行县志总纂	冷启鹤(214)
《四库全书总目》方志批评散论	宋永平(235)

后 记

枣花虽小结实诚

——序《方志理论研究》

宁 超

《方志理论研究》第一辑要出版了，几位年轻编辑要我写篇序言。想了好一阵子，忽然记起了《增广贤文》上的两句话：“牡丹花好空入月，枣花虽小结实诚。”于是便把其中一句拿来做为这篇序言的标题。这两句话似乎来自古代的某一种话本或章回小说，是不折不扣的街头巷尾市民俚语，但其内涵却正是我打算要在序言中叙说的意思。

先说我和本办公室诸同事以及地州市县许多修志同行八十年代初对地方志编写的理解和实际工作水平。

我是1984年中期调来做地方志工作的。在此之前，为了研究云南地方史和中缅、中越关系史上的某些课题，曾涉猎过几页云南地方志。当时，只感到这种文献确实很有意思。在这种书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奇文异事，乃至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用“包罗万象”这句话形容它，似乎并不算过分。尤其令我惊异的是，这种书中记载的许多历史事实，在那些皇皇正史中几乎没有，或者仅是简单几句话，难得其详，常常令人引为憾事。所以在感到惊奇之外，又增添了一层意思：地方志是研究和了解中国或云南历

史必不可少的补充资料。话虽如此说，但及至八四年调来省志办后，看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章程》，及其对新编志书在体例、结构、内涵、行文、指导思想、功能、属性等许多方面的要求，这时才发现自己过去虽然读过几本地方志，自以为对地方志还有所了解，其实对地方志这种文献并不了解，用“一无所知”、“无所措手足”这两句话来对照自己当时的尴尬处境也并不算过分。即时，深深地后悔和自责：何以当初看地方志时，只是“蜻蜓点水”，吸取一滴！“书到用时方知少”，自己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是大有问题。的。后悔、自卑、羞愧、苦闷（打不开工作局面）……可谓“百感交集”。此等心绪，至今记忆犹新。当然，说上面的话并不等于自己现在对地方志就了解得很多、研究得很深入了，肩负的地方志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恰恰相反，自己对地方志这一学科仍然知之甚少，研究的很不够，只能算是初步进入“情况”。至于“登堂入室”穷其妙理，尚有待于努力！

其次，环顾当时省志办公室诸同僚，乃至地州县许多修志同行，他们干这一工作比我早四五年，早已进入“情况”，发表了一些文章，但认真考究起来，能够对地方志编纂理论、方法说出个甲乙丙丁来的人，数目并不多。如果再追根问底，究其所以然，更没有多少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当时我还发现，即便是他们写出的理论文章，不少还是“进口货”——引伸外省方志界先知先觉者的言论，真正属于自己的创见还不多见。最初那几年，我们这些从省到县做地方志编纂的人，不论是在组织发动，还是在编纂方法上，大多学的是外省同行的理论和经验，自己的东西微乎其微。“人家哭爹，我哭爹；人家哭娘，我哭娘。”这句话虽然过于刻薄，

但如果拿来对照我们最初几年的工作状况，也不能否认它的几分真实性。

我本人及我的许多本省同行的上述诸种状况完全符合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规律。这不是什么耻辱，它乃是人们一般从事任何一项工作不可避免的经历。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总司令以及许多著名的先烈们，伟人哉！但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之初，在五十年代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不是也经历过照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方法、经验这个过程吗？伟大人物尚且如此，我辈何人，能够逃脱此一规律？此其一。其二，编写地方志在中国已中断了半个多世纪，而我们要编写的东西——一省、一州、一县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封建时代和半个多世纪前相比较已大不相同。编写志书的人没有学过这种学科，不具备编写经验、方法，而面对的对象又是如此分工细而复杂交错，因此，我们经历上述那样一个过程也就可以原谅了。

十年时间过去了。古诗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天同十年前相比，云南的地方志工作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卷帙浩繁的新编《云南省志》部分分志已开始正式出版。弥勒、镇雄、江城、元阳、永胜县志亦同世人见面。变化最大的是，我们的志书编写班子——不仅在人的数目，而在于他们的业务水平，在数以千计的地方志编写队伍中，有一批同志脱颖而出，他们分布在从省到县的各级志书编写机构中。十年来，他们钻研旧地方志和方志学家的理论，从在我国延续了千余年的这种古文献中吸取了地方志的基础知识和编写技能，从外省新编写的地方志书和文章中，学会了编写新志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他们还结合本省、本县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把这些见解

用于指导本地的志书编写活动，而且发表于《中国地方志》等国家和外省的方志刊物上，或提交给地方志学术会议，参与地方志学科的争鸣。这本小书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众多较有成就的同志中的一小部分成果。总之，我们省地方志界的许多同志已走完这一学科的启蒙阶段，而步入研讨其究竟的境界。也就是说，我们再也不象十年前那样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是比较能够知其然和所以然了。当然，我这样估价绝不是因此而夜郎自大，井底观天。因为天外有天，我们有所成就，有所进步，但是不少兄弟省的地方志编纂比我们成就更大，那里的方志界同行地方志理论水平更高，进步更快。我的目的只是想印证上列《增广贤文》中的那两句话：外省方志界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好比牡丹花，我和许多人一样，喜爱、羡慕、敬佩体型硕大、雍容华贵的牡丹，但我又觉得那是别人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枣花小如米粒，而且没有牡丹那样引人注目的气派，但它却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从工作实践中辛勤栽培出来的结晶，既诚且实，更觉可爱。

中国的这一代修志工作虽然已经历了十年，实则方兴未艾。大面积的志书之完稿出版大约要在本世纪末。当大家动手之初，为了编好第一代社会主义方志，面对细密、复杂又相互渗透的社会分工，曾经发表了成百上千篇文章，并把它运用于具体编写工作之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不仅有待于观察它在编纂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是否适用，更重要的是还有待于用这些理论、方法编写出来的志书是否能够被社会承认，能不能经受住社会和历史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地方志理论其发展高潮不在目前，而在十年之后。因此，我盼望本省的方志界志士仁人不能满足于眼下这几朵“枣花”，而应该努力钻研，

大胆探索，栽培出一盆一盆的“牡丹花”。不仅把目前手头的志书编好，而且要为地方志学科、地方志理论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创办《方志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本办公室、本省从事地方志编写和研究的同志提供一个展现自己得意之作的园地（《云南方志》也是园地之一），一是希望它逐年办下去，二是一期比一期好，使它成为一个展览云南地方志研究成果的小窗口。

1990年4月5日

扩大方志研究的视野

温益群

八十年代，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客观地分析了这一现实，认为方志研究中存在着的封闭性、重实用轻基础状况应该改变，主张在评论志稿基础上建立方志批评，提出方志研究不仅要注意过去，而且应着眼于当代和未来。

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开展十年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各地区各行业通过修志工作，对历史与现状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一批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方志陆续问世；在志书之外，产生了一批年鉴、概况、专题资料汇编等副产品，为各级领导决策起到了有价值的咨询作用；修志工作者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方志理论作了研究探索，为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罗列这些使方志工作者感到自豪的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方志学正面临着现代社会的挑战，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在步入她繁荣年华的时候，也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困惑。

这种困惑，不同程度地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在方志学自命并要求社会承认自己是一门独立学科的情况下，理论研

究者对如何建立和完善新方志学理论与学说体系，还没有相应地提出一套完整系统的方案；新方志学对自己的学科目标、学科归属、学科体系和学科规范，还不具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传统的方志理论、志书体裁形式、编纂方法程序对与旧时代相比日益具有深度和广度的当代社会生活所留下的资料，已经感到很难得心应手地处理；在传统方志学的局限与弱点日益明显、新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对方志提出了新的要求的情况下，方志界在整体上的应变对策和行动措施却迟迟没有推出；在方志学领域，缺乏准确的、科学的术语和概念，目前已有的为数有限的概念大多含混不清，没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使编纂实践没有规范的准则可遵循，使理论探讨和争论缺乏共同的前提，等等。

正视以上情况，不是对修志工作泼冷水，而是一种热潮中的冷静思考。其目的是想使九十年代的方志研究在观念意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比八十年代有一些明显突破：

一、变方志研究领域的封闭性为开放性

在现代社会，各门学科的研究内容互相交叉和渗透、研究方法互相启发和借鉴、研究成果互相促进和利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相比之下，方志研究领域就显得较为封闭。它过分陶醉于“中国地方志历史悠久”的自豪中，认为地方志是地道的国粹，修志理论早已有祖先奠定下坚实的基础。这种思想，使修志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时，缺乏一种汲取国内外现代学科的有益养分为自己所用的心理准备和观念意识，从而导致它失去了很多理论滋养，章学诚等作古之人的影子经久不衰地游荡在方志界，现代科学之光极少照得进这个领域。

章学诚是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成就是清代学风影响下的产物。清代的学术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这就是它没有自己一代的明显特点，而是汲取和融化它以前各代各派的特点和精华，然后归于一己或一派，所以说清代是集以前各代学术大成的一个时代。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章学诚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集封建时代方志理论之大成，在地方志书的性质、作用、源流、体例、编纂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套见解，因此梁启超认为“方志学之成立，自实斋始也”。章学诚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说，并不封闭，他无愧于那个时代。当代方志研究除了继承和发扬章氏理论的精华，还应该学习他博采众家、以识见长的治学方法。正如前面所述，当代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特点是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互相交叉渗透，互相启迪借鉴，方志学与其他学科接触甚少的状况必须改变，否则新方志的科学性、时代性就是空谈。

前段时间，一些方志学研究者将“新三论”、“老三论”等学科的原理概念及研究方法运用到方志理论研究中时，有生吞活剥之感，引起了一些批评和指责后，一时间又销声匿迹。其实大可不必因噎废食，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出去是不妥的。对探索和尝试时，某些不成熟和牵强的东西，不要简单地抛冷眼、扣帽子，初期有点生吞活剥的现象，不排斥深入下去可得其要领并运用自如；新、老三论用不上，不等于其他理论和方法也用不上，开放性的观念意识和求真务实的治学方法，是方志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两个必要条件。

二、变重应用轻基础的研究方向为 二者齐头并进

本届修志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理论准备还不太充分的情况下，修志工作已经在全国大规模地铺开。各级地方志办公室的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文学等领域和行政管理部门改行过来的，他们对地方志的基础理论还来不及经过一个系统地接受消化过程，便匆忙上阵；各专志的编写者多半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专家，修志之前，他们擅长的是各自的专业技术业务，志书编成之后，他们仍然准备继续从事原来的专业工作。编纂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具体问题、各级政府对成书时限的紧迫要求，使方志工作者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先去把基础理论研究透彻再来进行修志实践；对原专业的热爱和志书修好后仍将归队的客观现实，使各专志的编写者过多地着眼于“怎样编”之类的方法探讨上，对“为什么要这样编”、“这样编将会怎么样”之类的问题不感兴趣，认为与自己相隔太远，甚至无关。

在这几年方志研究中，确有一批颇有见地、相对超然于工作实践之上的基础理论思辨性文章，但数量甚微；绝大部分文章多侧重于探讨某些个别问题的具体处理方法。换言之，从方志编纂方法论的角度来研究具体问题的人多，从方志哲学的意义上来考虑地方志的性质、作用、功能和方志学的学科目标、学科归属、学科体系、学科规范的人少。而对一门学科来说，如果它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升不到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思考，那必然会制约着这门学科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曾经有一些其他学科的人认为“方志无学”，有的只是一

些具体的编纂方法与技巧，称不上“学”，这种看法固然片面，但多少也透露出一种实情：当前方志学基础理论不完善、不深入、不系统。

尽管方志学是一门实用科学，而不是一门思辨科学，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它的理论结构中可以重应用而轻基础。基础理论的研究虽然不能为某一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能够从宏观上提出问题，开拓具体研究的思路，把握应用研究的方向。目前，基础理论构建方面的薄弱，使许多具体方法论的研究长期以来莫衷一是，深入不下去。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八十年代修志工作的特点要求方志工作者首先回答实践中的问题，侧重从具体微观的研究入手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大部分志稿成书问世的情况下，根据十年实践，对基础理论进行阶段性总结就是可能和必要的了。基础理论的归纳应有一定的高度，既来源于实践，又必须高于实践。没有清代全国各地大规模修志的社会环境，没有当时各门方志流派争鸣探讨的学术氛围，章学诚的理论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如果章学诚只满足于修出几部名志，不高屋建瓴地从基础理论上来分析研究问题，传统的方志理论也不可能在他手上集大成。这也是历史对建立健全新方志理论所提供的一种借鉴。

三、在志稿评论的基础上建立 方志批评学

从具体的编纂实践到系统理论的升华，中间需要有一些环节，方志批评即是其中重要一环。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文艺批评对文艺理论繁荣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中得到一些启迪。文学艺术中许多观点和见解的系统化、理论化，并不是由作者在其创作阶段完成的，作者在创作阶段，对自己的主张、风格、流派等，往往是处于一种自然表现、自然流露的状态中。由于批评家能持有超然于作品之外的态度和宏观比较、综合审视的眼光，所以作者的创作意识、创作手法、作者观点与其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作品将产生的社会效果等问题，经他们总结研究后，就能升华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从而对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的繁荣，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就方志学领域来看，董一博同志早在1985年就提出“开展方志评论，提高修志水平”。他认为：“方志是一个时代的旗帜，同时，也标志着那个时代的操觚者和评论者的水平。一个时代的名志佳本或是诟陋之作，固应首推纂者，但是，尤赖评论家的慧眼妙笔，评其得失，论其正误，对是非、真伪及臧否问题，可质言而论，进一步对志观、志材、志法等得以述其究竟，将方志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①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各地的志书从初稿形成到正式出书，各种方式的志书评论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但是，正像董老所使用的概念是“评论”而不是“批评”一样，这几年方志评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总结方志工作的经验教训和提高编纂志书的质量，方志工作者还没有将它提高到总结方志理论、阐述学术见解的意义上认识，它只是为方志批评奠定了一些基础。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方志批评学。

^① 《中国地方志》1985年第3期

当然，抽象地从概念上来对“评论”和“批评”作严格划分，不太容易，似乎也无必要。但在当前志书评论活动风行而方志批评意识淡漠的情况下，对二者作一些辨析，或许是有意义的。它们的区别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志稿评论，主要着眼于志稿本身的体例结构是否科学、历史事实是否真实可信、文字表述是否准确客观；志书批评，侧重于从哲学的角度借志书来发表批评家自己的见解，从具体的批评对象中发现并抽出一些共性的问题，然后将其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研究。

其二，志书评论，多少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它提出的大多是具体意见，为评而评，评完了事，往往是将被评的对象从一定的整体中抽出来，进行单个的分析，评此稿不涉彼稿；在志书批评中，某部具体的志稿已经不再是批评家的最终目的，只是借以表述和阐发自己观点的一个媒介，志书批评主要是为了方志理论构建，是为了给更多的志书评论提供科学规范的理论依据。

其三，志书评论是根据已有的理论来对志书进行衡量；志书批评则不尽然，它可以根据批评家自己的看法来衡量，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使原有的理论得到新的发展。

由此，我们说方志批评是方志理论系统化和深入化的重要途径。

四、将注意力从过去转移一部分 投向当代和未来

美国当代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在给《第四次浪潮》一